

北京大学
教育经济研究所、高等教育研究所

简 报

2011年第03期（总第132期）

2011年11月22日

高等教育的世界趋势：对发展中国家的启示

菲利普·阿特巴赫

美国波士顿学院国际高等教育研究中心

【编者按：应北京大学“海外名师讲学计划”邀请，国际著名教育学者、美国波士顿学院国际高等教育研究中心主任菲利普·阿特巴赫（Philip G. Altbach）教授进行了题为“高等教育的世界趋势：对发展中国家的启示”学术讲座。本期简报是根据阿特巴赫的讲座录音整理的。】

今天我在这里用英语演讲，你们可以理解我；如果你们去波士顿用中文演讲，我们会很尴尬：我们不懂中文。今天的讲座主要就影响高等教育的全球趋势进行讨论，其中的一个趋势，也就是我即将谈论到的——英语。显然，我现在可以用英语跟中国的听众交流，十年前这也是可能的，但即使在现在，你们在中国以外的地方也很难用中文进行交流，英语现在已经成为全球性的语言。

西方英语国家在很多方面都掌控着全球科学。这一趋势对中国会产生深远的影响，对全球其他国家也会如此。一部分也正是因为语言的关系。对于非西方世界，你怎样对待全球化的英语趋势，对抗还是融入？你会改变自己的语言甚至是结构吗？有些国家正在用英语来替代当地语言。你会要求大学教授在英文期刊发表文章吗？而使用英语的意义何在呢？英语不

仅仅是一种交流工具，它更是一种思维方式和文化。正视这些问题，对于中国在全球学术领域的发展和独立，或者二者兼顾，都具有重要的意义。所以语言是我接下来将讨论的全球趋势之一。这次演讲及其所使用的语言正是这个趋势的例子。

现在我尽量在短时间内就全球高等教育所面临的问题进行大致的论述和简要的概括，这对于你们学校甚至国家都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因为中国作为一个大国，有着最为庞大的教育系统，美国位列第二了。在美国国内，我们认为美国高等教育在很多方面都屈居第二了，甚至还正在下降。对于美国在全球所扮演的角色，美国国内存在着强烈的悲观主义。你们可能会认为坐在麦当劳，买一件 GAP，用苹果电脑，美国是世界头号强国。然而我们自己却不这样认为，我们很悲观。因为我们知道很多 GAP 和苹果产品是在中国生产的，而你们的问题是你们只是加工而并非设计。中国教育界应当努力创造这样一种文化，使得中国在未来能够设计世界性的产品，能够不只是在制造产品上竞争，还可以在创意上竞争。这是全球化的一部分，这部分也是目前我认为中国在全球革命中还未达到最高水平的部分。你们的问题是，你们能做到吗？何时才能做到？后面我还会给你们提出了很多问题。我所要做的是就全球高等教育革命进行讨论，因为我们正身处一个对高等教育产生深远影响的革命之中。

在二十世纪初期，伴随着西方研究型大学的兴起，伴随着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期一种新兴学术文化的发展，我们开始看到了全球高等教育的巨大改变。尽管我们深处巨变之中，很多时候我们仍然难以适应这种变化所产生的影响，所以我希望能够就这些变化的背景和产生的影响做一个总结和概括。

在我看来，影响二十一世纪学术变革的驱动力量有两个，目前最主要的就是全球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发展，这是过去相比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因为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高等教育是精英教育，是针对少数人；全世界范围内很多公立大学仅仅在一个小范围内为社会高等阶层的小部分人服务。在很多国家，这一现象已经发生了改变。毫无例外，高等教育现在为绝大多数的人服务，初级教育和中等教育已经得到普及，这种基础教育的普及和发展不可避免的也会在高等教育上得到体现。什么都不能阻止它，任何国家和政府都不能阻碍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发展。所以，我们要准备好

应对措施。2007 年全球有 1.5 亿学生在接受高等教育，而在十年前只有不到 1 亿学生，这种扩大今天仍在继续。

今天我将讨论高等教育大众化对大学系统所产生的影响，因为我认为这是主要的驱动因素。扩招将继续扩大。在许多国家，如美国、西欧、俄罗斯、东欧，我们已经到达了大众扩张的顶峰，只会有小幅的增长。70%~85%的孩子高中毕业后继续接受教育，这个比例是很高的。而全球的很多其他国家，包括中国，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如何应对高等教育扩招，中国和其他国家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实际上，在未来的 30 年里，全球一半的高等教育扩招人数会在两个国家发生——中国和印度。为什么？因为中国的入学比例仅达到 23%--26%，而印度仅仅是 11%，这意味着发展空间还很大，而且两个国家也都有扩招的目标和计划。

在另外一些地方，如非洲，平均入学比例仅为 5%，所以他们的扩张空间更大，但是资源有限。拉丁美洲国家在中等收入国家中表现最好，高等教育入学率为 30%，有些国家还超过这个数字。因此，在未来每个国家的扩张程度和性质都会不同，但都将在各个层面对世界产生深远影响。中国将如何处理大众教育的发展？

另外一点非常重要问题，扩招的对立面，就是全球知识经济和研究型大学。所以，目前的教育系统以大众教育为基础、研究型大学位居顶端。这两者要如何同时发展？在很多方面，两者代表着截然相反的问题。我希望能够从讨论中得到一点启发，这也就是我今天的目的所在。

另外一个问题由于时间原因我可能没法探讨了，而且我也不是一个经济学家。世界正在经历一场经济浩劫，它在以不同的方式影响着各个国家，当然，受影响最大的是欧洲和北美。我们刚开始看到这场危机的影响，危机还在持续，这对我们来说是不幸的，也会很快变成你们的不幸。我们目前看到经济形势时好时坏，就像波浪一样，我们无法预测未来。欧洲和美国的宏观经济政策以不同的形式失败了。欧洲国家探讨不出如何拯救欧元，如何扭转经济局势。我们也不知道如何去刺激我们的经济发展，因为政治上的愚蠢。我们不清楚未来会怎样，我们还想不出建构性的政策。我们不清楚发达国家未来长期的经济发展，一个糟糕的经济必然会对世界其他国家都产生影响。可能影响最大的就是中国，中国为我们生产加工很多产品，经济危机将会影响到我们的购买力。这对我们高等教育的发展又意味着什

么呢？随着我们的衰退，你们会有机会得到发展。假设你们的经济会发展的更好，有专家这么认为，你们不会像我们这样糟糕。你们该如何发展呢，如何利用这个短暂的有利时机？

对我们而言，仅仅先以美国为例，我们的公立大学由州政府来创办，美国没有全国性大学。由于经济危机的影响，有些州政府已经缩减了 20% 的基本经费预算。这给我们的大学甚至是一些顶尖学府，都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如加利福尼亚大学等，都面临着教职员和高质量生源的流失，奖学金也在减少。一切都正在恶化。我们引以为傲的著名学府，当然了一半以上都是私立。你们也许知道 80% 的是公立的，私立仅占 20%，但私立的却是最为顶尖的大学。有些私立大学状况良好，因为他们的经费来自于学生学费和捐赠。捐赠运转很好，生源不断，私立学校，像是我所在的大学，就能从公立大学中聘用到好的教授。但我们要说的是，美国经济衰退对教育系统所产生的影响，对于那些顶级的州立研究型大学而言可能是个悲剧。所以，中国和其他国家将能借此机会进一步发展。

经济危机所产生的另外一个影响是，处于教育系统底层的学生将要缴纳更多的学费。所以，我们在教育系统的顶端和底部都出现了问题。这些问题对你们而言是可以借鉴的。欧洲的问题有所不同，但也同样重要。在过去的几年里，欧洲高等教育系统，由于各个国家情况的不同，我只是做一个大致的分析。在除英国以外的其他欧洲大陆国家，他们有选择地对小部分大学投入更多的资金，这跟中国无异。现在欧洲国家仍在践行这个很好的政策，但同时也引发了严重的经济问题。所以我认为在不久的将来，他们将会难以维持最好的大学在教育水平方面的上升。英国在不断减少高等教育支出，征收高额学费，无法给科研提供充足经费。作为一个强有力的国际竞争者，他们同样在未来发展中面临着困境。经济危机对这一切都产生了影响，这些影响正在全球发生着。

让我们来谈论一下全球高等教育变革中所面临的挑战，由于时间关系我仅就其中几点而非全盘讨论，这几点我认为与中国最为相关。你们的任务就是从我对全球形式的综合评论中去思考这些对你们国家会产生怎样的影响，你们应该如何去理解，因为理解是首要的也是最重要的。

在大学里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大学里的群体可以理解物理、化学、文学等一系列问题，但不明白大学是如何运作的，不理解大学的本质是什么，

如何做好管理。当然，在座的诸位都了解什么是大学，你们中的一些人就是研究大学本质问题的，一些人还正在从事高等教育的教学工作。问题是，在这里还有其他一些地方，包括美国，大部分大学的领导者是非常优秀卓越的科学家，然而他们对于大学是怎样运作的一无所知。我们的知识是很重要的，如果这些领导能够坐在这里来思考一下这些问题那就再好不过了。至少我们可以一起探讨一下，你们要做的就是了解我综合性观点，看看对你们是否适用。

高等教育面临的第一个调整就是研究，这是全球变革的影响。重大领域的基础研究如何持续和繁荣？在公众问责的背景下？在大学与工业日趋紧密的结合下？在有限的科研经费支持下？我们面临着诸如此类的问题。当然最基本的研究可能会产生诺贝尔奖。诺贝尔奖是很高的荣誉，上海交通大学的世界大学排名很重视这个奖项，依我看来有些过于重视。诺贝尔奖是基础研究的象征。但是诺贝尔奖并没有纳入任何一个人的科研预算中。诺贝尔奖项发明所带来的影响可能要很多年才能看到，甚至几十年，一个世纪。当爱因斯坦发现了相对论，在 20 世纪初没有人知道他在说什么。整整五十年之后人们才意识到这个理论所带有的积极作用，以及在原子动力和其他令人不愉快的方面的重大影响。基础科学需要时间，然而大学领导和政府都没有足够的耐心等待。我们如何发展基础科学，在上述我提及的公众问责等背景下？我们需要告诉我们的政府和高校领导，基础研究很重要。

对基础研究的长期支持已经成为是美国研究系统中一个重要的优点。我们在研究型大学，尤其是在私立学校已经达成了一种长期共识：不是进行大型规划，而是认识到大学是一种重要的复杂机构，大学需要时间去发展，大学所创造的知识同样需要时间去很长时间去发展和成熟。

研究机构的组织体制同样重要，大多数人认为最有效的学术研究机构的组织是在大学的情境下进行，因此大学同时包含了教学和研究的职能。中国和其他一些国家都有设立非大学研究机构的传统，比如从前苏联引进的科学院体制，对你们来说是一个糟糕的借鉴。俄罗斯现在自己正在改变这种体制，这需要一定的时间。

国家之间互相借鉴。美国的研究型大学基于三个观念，其中两个是来自外国的，只有一个是美国本土的。这三个观念是：1、英国殖民大学的

本科生教育，即通识教育课程；2、在 19 世纪中期借鉴的德国洪堡大学模式；3、服务社会的观念，这是美国原创的思想。我过去在威斯康星大学教书时，在主建筑前的一块大石头上有这样一句话“大学的边界决定了州的边界”，这就是说威斯康星大学的教师应当为整个州服务，最初体现在农方面，现在是工业、科技方面。这也是美国赠地学院的理念。这三个理念塑造美国的高等教育。

一些殖民地国家吸收了殖民国家的观念，尤其是英殖民地国家。他们是幸运的，因为英国模式是很好的，而且英国对教育出口也很感兴趣。葡萄牙殖民地国家，比如澳门和巴西，就没那么幸运了，因为葡萄牙对高等教育的发展兴趣不大。实际上，像是巴西，当今最重要的国家之一，直到 1920 年还没有一所大学，因为当时葡萄牙人没有建立大学。巴西人自己建立了第一所大学。中国从未被全部殖民占领过，只是被半殖民占领过，中国吸收了德国模式、日本模式以及英国模式的许多方面，并进行了整合，但问题是，当然我并不是中国问题的专家，中国在建立新中国之后，你们完全借鉴了苏联模式。从某些方面来说，这是一个成功的学术模式，他们在科学发展方面做得很好，但某些方面却不是很有成效。当然了今天的俄罗斯也正在改变自己的历史传统。但是建构出一个能在本土成功的学术研究机构并不那么简单。也许现在的科学院体制对你们来说可能存在很多问题，当然我并不了解很多细节，但是目前俄罗斯把科学院体制整合进大学的做法不失为一个好的做法，可以使得学生参与科研，诸多有利的地方。同时，还需要说服政府和私人机构认识到所有类型研究——基础和应用的——重要，而且认识到：不要控制太多，不要告诉研究中应该怎么做研究。

美国系统这些年来的发展被证明是成功的，很多科学研究由联邦政府提供经费支持，但并不直接分给各个大学，而是展开有效的竞争。所以大学和教授可以展开竞争，争取研究经费。虽然这个系统并不完善，但总体来说还是一个好的系统，因为这意味着政府并不直接分配，而是好的研究设计一般都会胜出。

接下来让我们来谈论另外一个对中国和很多国家至关重要的挑战，那就是私立教育的挑战，中文也叫“民办”；以及公立大学的私立化，这对于中国而言不是什么大问题，但对美国来说却是个问题。私立教育近些年发展很快，这对很多人来说都是值得惊讶的，但事实如此。过去很多以公立

教育占主导地位的国家现在都以私立教育占多数。几乎整个拉丁美洲都是这样的特点，当然在非洲的进程也已经开始，在拥有世界第三大学术系统的国家——印度也呈现了这种变化趋势。在中国、美国以及印度之后，唯一没有发生私有化改革的西欧。西欧目前仍然是 99% 的公立，而且没有变化的趋势。我们如何能够通过私立教育来满足广大的公众利益需求？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我们如何评估私立教育部门的质量？我们如何保证私立教育的透明性，以保证我们能够了解他们的现状？因为很多私立部门，再次强调一下我并没有特指中国，因为我并非很了解中国情况。一般而言很多私立部门不想公开他们的运作，比如资金去向，招生，学生状况以及完成学业状况。我们如何对他们进行质量控制呢？宏观来说，我们怎样才能确保私立部门服务广泛的公共利益？

很多国家都面临这样一个问题，尤其是全球大多数私立学校是以盈利为目的的，而不像传统美国私立大学几乎都不是以盈利为目的。很多美国私立大学是很古老的大学，包括哈佛和普林斯顿大学，他们的历史比公立大学早了一百至二百年。我们如何管理这些私立部门具有重要意义。大多数私立大学名望不高甚至质量低下。我曾经说过只有两个国家有私立研究型大学，美国和日本。现在越来越多。一小部分其他国家，比如智利，有非赢利的高质量私立学府，但仅仅是一小部分。大部分私立大学还是教学导向，他们中的大多数有地域优势或者时间优势而非高质量，而且选择私立学府的学生比选择公立学校的学生更有能力支付高昂的学费，这当然不是一个好的政策，但这却是无可非议的事实。

现在美国很多盈利性私立大学出现了一系列丑闻。主要是这些营利组织用政府贷款项目招收不合格的学生，然后这些学生通常不完成学业。这样政府就支付了成百万的无意义资金，而学生可以把这些贷款拥为己有。美国很多报纸上都报道了这类丑闻。当然中国民办教育也面临着自己的问题，这也是你们要思考解决的，因为它正在迅速成长为你们系统的一部分，这一点毫无疑问因为公立大学肯定不能独自应对高等教育的大众化趋势。

另外一个相关问题是公立大学的私有化，当然我并不了解中国的情况，但这在美国是个严重的问题，在英国、澳大利亚等国家也正逐渐变成挑战。大学从政府获得的资金支持越来越少，政府要求大学自主创收，大学是如何应对呢？他们提高学生学费，导致学生无法接受高等教育；他们从别的

途径来增加收入，比如出售知识，提供咨询等途径。我知道这种状况在中国也有。一个很著名的例子就是美国弗吉尼亚州立大学，一个非常优秀的公立大学，目前每年从州政府获得的财政支持只占到预算的 9%，其他都是自主创收。然而他们希望转变成为私立大学的请求又被政府否定了。当然了，我强调的重点是很多公立大学正在向私有化转变。其中一种转化方式是，我知道中国也有这样的问题，同样的问题在非洲等其他国家也都出现了，公立大学增加了夜校以及其他赚取学费的途径，这是一个非常糟糕的做法，为什么？尤其是在很多优秀大学中，由于教授挤占了科研和教学时间来完成额外的教学任务，并以此来提高收入，这样就减少了科研的时间，虽然学校不用直接给他们增加薪水，但实际上他们的收入提高了，可是这样一来大学的使命也就改变了。

另外一个问题是以一流大学根据学生的质量来招生，比如高考制度。但是如果支付更多钱的学生，一般而言他们是不合格的，不必参加同样的考试，那就意味着长久来看你的学位贬值了。这并不是一个好事情，因此一般来说，在高等教育管理中公共部门私有化存在很多的问题。

现在我将简要概括一下其他的挑战。其中一个公众问责。全球的大学都面临着政府和私人信托机构关于资金运作的质问，大学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这是合理的，因为对大学的财政支持在不断增加，但是同时大学也需要自主权。大学的需求必须要达到一种平衡，但我不知道在问责和自主权之间达成平衡实际上意味着什么。在很多体系中，我认为中国也是这样，大学面临着太多的义务却没有足够的自主权。这个问题在全球日趋严峻。

另外一个要说的相关问题是，对于在座各位高等教育的专家学者来说，如何管理日趋庞大和复杂的教育系统也是一个问题。我们的校长是如何选举出来的？很多大学是同事选举出来的，在中国我想可能并非如此。很多情况下，大学教授们选举出来的并不是最优秀的领导者，而是一个“老好人”，或者是一个不太可能造成巨大风险的人。大多数情况他们选出来的并非高等教育的专家，甚至可以说丝毫不懂如何管理一所大学。可以说，他们选出来的仅仅是一个优秀的教授，这就是问题所在，因为一个学术机构正在日益变得复杂，需要好的管理。

在美国我们通过两种途径在一定程度上解决这个问题，一个是我们不通过选举来确定校领导，他们由具有学校董事会指定，董事会是学校教授

的协商机构，而不是他们的权力机构。通常被任命为校长的人选都有过相关的大学管理经验。在过去的20年里我们由越来越多的女性担任一流大学的校长，现在这已经成为一种很大的趋势，哈佛的校长是位女性，普林斯顿大学的校长是位女性，很多女性都身居要职。我们指定的人选必须有管理经验，在教育领导者排名上名列前茅，从院长、教务长，直到副校长、校长等。有时我们采取外聘的形式招聘，有时是从校内但更多的是从别的学校招聘；有时在国内招聘，有时在全球范围内招聘。我能列举七八位美国校长是来自印度的印度人，他们中的大部分是在美国取得博士学位在美国工作。有极少一部分中国人做到很高的位置，有些是来自香港，有些是来自中国大陆，因为他们有着海外经验，并且能力超群。我们需要的是学术能力很强，理解大学的本质，同时具备管理能力的领导者。这很难但是不是不可能，这也是在座各位要思考的问题。

让我更加简要的谈论一下我们面临的招生挑战吧，这是与扩招最直接相关的。如何进行设计，以便从初等毕业的合格高中生可以进入大学？或者说，我们如何设计招生，以便学生可以在大学获得成功？我很喜欢的一个例子是南美的阿根廷，他们解决招生问题通过这样一项法规：每一个高中毕业生可以不受限制的选择任何一所他们喜欢的大学。很多人都想进入阿根廷大学，国家的顶级大学。大学校长不得拒绝，所以他们在第一年会淘汰掉70%的学生，因为没有学费，所以一切都由政府买单，这种淘汰制度是很有效率的，但对学生而言是很不利的，他们浪费掉了一年的时间，打击自信，而且没有得到学位，可能他们会转到相对次一点的大学，一切都要重新开始。这是通过优胜劣汰来解决准入问题，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因为总体来说，高等教育体系中数量的扩大必然导致整体上质量的下降，因为很多学生不够聪明，或者说没有尖子生聪明，但是仍然想接受高等教育。另外一个降低质量的原因是没有任何一个系统，不管是公立的还是私有的，能够给所有人提供高质量的教育。还有一个相关原因是，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仅仅是猜测，在全球范围内很多从事教育的工作者仅仅有本科学历，我不清楚在中国有多少教师具有硕士尤其是博士学位，但我敢肯定仅占极少一部分比例，当然不包括北大人大的这样的顶级学府。在很多国家教员的质量也在下降，这是不可避免的。

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启示和挑战，也就是我所说的分

层的学术体系，在中国已经部分实现了，但是还没有完善。举个例子吧，一个实践上较为成熟的分层体系是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从1962年开始，加州建构起了三层的高等教育体系，以社区学院在底部，实施开放式招生；州立大学在中部，实施高等教育大众化招生；这些系统仅仅有本科学位的授予权，有些可以授予硕士，但是都没有博士授予权。这样的大学在加州大约有35所。加州的顶级大学有9所，很多是世界一流大学。这些学校选择性很高，他们招手加利福尼亚州8%的高中毕业生，他们提供本科教育和研究生教育。加州系统很有特色的两点是：一、学生具有转学的权力，如果你是一个工薪阶层的很聪明的孩子，你在社区学院的成绩非常好，你就有机会转到伯克利这样的高等学府，法律规定了转校的权利。另外一个亮点是，政府规定大学必须保持自身在高等教育体系中的位置，也就是说州立大学想要转型成为研究型大学并设立博士点，加州政府不会允许这样的竞争，因为此类大学的主要任务是教学。当然大学会很不满意，因为谁都想在排名上有所上升。从公告政策的角度出发，这样的限制是有必要的。其他的国家也有类似的体系。中国的任务就是要找到类似适合自身的发展体系，可以提供学生的流动性，这在很多国家是个难题，比如德国，从系统底层的职业技术学院转到好的研究型大学基本是不可能的。所以不同的国家爱有着不同的做法，这都是应对挑战的方式。

我再简要说两点，咱们就进入讨论阶段。一个是学术职业的挑战，我已经做教授很多年，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职业。但是不仅仅对于我，对于每一个教授而言，这个职业一天天失去吸引力。伴随高等教育大众化，越来越多的人进入这个职业，但是我们看到的是越来越多的新人在选择兼职，没有升职的机会。在美国，我们所有的教师都有博士学位，甚至是在社区大学中绝大部分教师也都是博士，六年后他们或是升职或是开除或是另谋出路，其他的要么是全职要么是兼职。在我们的体系中，作为合同员工，你只有有限的时间。这种状况不仅发生在美国，在拉美也是如此，80%的大学教师是兼职的，这样的情况下是很难提高科研能力的，以兼职为主的学术体系是不牢靠的。拉美的高等教育发展将在很长时间内受到这个现状的制约。拉美唯一一个最为成功的、以全职大学教授为主的国家是巴西，全职教授和体制的成功之间的关系是直接的。

全球教育系统的薪资水平都有所下降，也就是说和社会中需要良好教

育的其他职业的工作者相比，薪资水平在降低。这么说吧，在美国当律师要比当大学教授多拿 30%-40% 的薪水。在教育管理系统也是如此，中小学的管理人员要比大学教育管理系教授的薪水高 30%-50%。当然大学教授的薪资是可以对抗通货膨胀的，但是比起我们的竞争者来说，是在下降的。中美同样是实行市场经济体制的，所以这对中国有几点启示。首先我们需要完成了对 21 世纪教育系统的薪水进行研究，包括最低工资水平，我们有个平均衡量指标，中国处于最低水平，在座各位可能并不吃惊，这是事实。我们分析了最低工资水平，工资结构，像中国教授有很多收入并不是来自工资。这也是中国所面临的一个问题，因为他们并不能把所有的时间投入到学术研究和教学上，他们还要忙着在另一个学校兼职，甚至是在夜校授课，那就是他们没有完全履行他们应有的职责，他们没有做出应有的贡献。这些对于学术职业来说都是很大的挑战。没有高质量、受过良好训练的大学教师，就没有高效的大学，也就没有世界一流大学，这是一个问题。

最后要谈的是科技带来的挑战。新技术给教学和学习带来的影响是显著的，但也是难以分析的。西方国家在 10 到 20 年前就谈论到教育与学习变革，我们仍在等待着这个变革的发生。网络教育在发展，但比很多人预想的要慢，但这种变革仍在继续。怎样在课堂教育中应用高科技？也许你注意到了我从来没有使用过这些新的科技手段，年龄和科技的运用有着直接的关系。但这种科技常被错误运用，有时是枯燥的、毫无创造性的。高科技的运用并不仅仅是我今天要用到 PPT，我们要对科技运用进行更有深程度的探索。这种变革正在发生，在大学的管理中已经出现，像是我们在用高科技来管理一些数据，这使得我们的大学管理更具效率。但是也可能意味着我们测量毫无意义的的数据。当我还在纽约一个部门任职时，纽约州系统提供的很多数据我都不理解更不用提运用了，其中一项是教员工作的衡量，通过课时、薪水、评分等一系列信息，来评价教学效率，虽然我们并不关心这些。重要的是这些信息都能够得到有效的利用。

最后一个挑战我不做具体阐述，我们可以共同探讨，就是国际化和多国化带来的机遇和挑战。作为国际知名学府，尤其是中国处于这样一个全球化的环境下，中国大学要考虑海外合作伙伴是谁？在其他地方是否考虑开办分校区？是否允许国外大学在本校开办分校？这些问题都涉及中国自己的国际化政策，要有你们自己来回答。是在国内还是在海外读博？大学

对英语使用的策略是什么？我们是否要提供英语讲授的课程？我们是否全部英文授课？我们是否要求教授在国际期刊用英文发表著作？是否为国际期刊的发表提供激励机制？这是很敏感的问题，我不确定这是一个好的观点，但这也是一个激励教师行为的做法。中国目前是国际大环境下的一个热点。很多国外的大学都想要跟中国大学合作，从某种程度上说是剥削你们；吸收国内有些的教授和学生资源；在学术研究上进行合作，有些是出于良好的愿望有些则不是。这是一个复杂的全球化世界，中国需要考虑清楚自身的国际化战略，你们选择跟谁合作，为什么，长期的战略目标又是什么，这都是很重要的问题。

这种问题在美国、英国等国家也常被问到。很多国外大学在北京都有办事机构，有些已经和某些大学建立了联系，有些是希望能够跟相关的研究机构建立起联系，这些都意味着什么？你们能够从中得到什么收益？你们是否愿意和在中国设立办公室的芝加哥大学建立联系，还是选择同样在积极与中国建立联系的衣阿华大学【编者按：这两所大学的办学目标、理念等都存在差异】？你们是否愿意和这些大学合作？国际环境真的很重要。

通过这个讲座，我仅仅是想让大家从总体上认识到学术变革的本质，让你们确信我们正身处于变革之中。你们确实要思考自己的对策：对内而言，作为一个大学；对外而言，作为一个国家、一个体系；对全球而言，作为这个息息相关的世界的一部分。

谢谢！

（向乔玉同学翻译，马莉萍、朱红校对）

本简报文章如需转载须事先征得本研究所同意，

并注明“转载于北京大学教育经济研究所、高等教育研究所简报”字样

主辑：岳昌君 编辑：孙冰玉

地址：北京市 海淀区 北京大学 教育经济研究所 邮编：100871

电话：(010) 6275-3935；6275-5662

传真：(010) 6275-5662

电子信箱：bysun@gse.pku.edu.cn

本《简报》及《北大教育经济研究》（电子季刊） 网址：<http://www.gse.pku.edu.cn>
